

目 录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 (6)

这是为什么?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人民日报》社论 (11)

工人说话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 (15)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社论 (18)

附 录:

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摘录)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刘少奇 (24)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摘录)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费孝通 (40)

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摘录)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章伯钧 (50)

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摘录）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罗隆基（54）

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摘录）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章乃器（61）

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摘录）

（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储安平（66）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人民日报》社论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

向期間挂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綫，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系統性不明顯。就民盟、農工的成員說來，不是全體，也不是多數。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人數，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數被蒙蔽，少數是右翼骨幹。因為他們是右翼骨幹，人數雖少，神通卻是相當大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新聞記者協會開了兩次會，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時間不過一個多月，反映了中國時局變化之速。會是開得好的，第一次黑雲壓城城欲摧，擺出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綫。近日開的第二次會，空氣變了，右派仍然頑抗，多數人算是有了正確方向。

文匯報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一些錯誤。作自我批評是好的。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我們認為文匯報的批評是不夠的。這個不夠，帶着根本性質。就是說文匯報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論中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

要无条件地鼓励鳴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見或者对錯誤的意見进行反批評，就会影响鳴放”。是这样的嗎？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針，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在一个时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对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間，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讓魍魎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見，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說，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場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讓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場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內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羣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謂批評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說，这是阴谋。我們說，这是阳謀。因为事先告訴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歼灭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鋤几次草嗎？草鋤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針公开告訴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們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

的絕對优势，看成了絕對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鳴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頃刻大乱，共产党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計。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夺取权力也。他們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針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騙，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說：“而所以发生这些錯誤認識，是因为我們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資产階級办报思想”。錯了，应改为“充滿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資产階級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資产階級思想，够用嗎？这里是一种什么邏輯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結論，这就是文汇报的邏輯。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聞，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論，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編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經作了許多比較認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錯誤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对于人民事业的責任心，这个报纸在讀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責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們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債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債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給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讀者要問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現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沒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轉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認真地照它那样办。

現在又回到“資产階級右派”这个名称。資产階級右派就

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說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資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現出来了。他們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別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輕視。这种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动，他們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們不适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現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寬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改，繼續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則，对他們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論，无行动。言論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寬大些了。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干淨，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羣众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們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們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繼續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是可以順利进行了。

选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

我們的党一九四二年开始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革命胜利的結果。現在，……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們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們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設，要能够更好地調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轉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設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須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許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經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羣众的拥护，有許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問題，而有一部分立場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羣众。几年以来，在我們党内，脱离羣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針，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

觀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

(二)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會議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會議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經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繼續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羣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討論，就我們党來說，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各級党委必須组织关于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按照这两个报告的基本思想，并参考一些其他有关的文件，总结和改进本地区、本部門、本单位的工作。在学习中，对于各級领导机关的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針和“勤儉建国”方針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羣众、农民羣众、士兵羣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羣众的官僚主义現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羣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現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現象，而真正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的指示。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們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羣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項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們联系工农羣众，分清无产階級立場和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立場，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

分子黨員還必須在今後的適當時期進行唯物辯證法的学习，关于这一方面学习的計劃，将来另行規定。

(三)

这次整风运动，應該是一次既严肃認真又和风細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應該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运动。开会應該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談会和小组会，應該多采用同志間談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談，而不要开批評大会，或者斗争大会。不論在座談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評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談的时候，都應該放手鼓励批評，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則，不應該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絕別人的批評。同时，对于批評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別人的一切，使批評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評。每个人都應該虛心地听取別人的意見，积极地向別人提意見，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評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評。对于一些带原則性的爭論，可能的时候應該作出必要的結論，但是必須容許保留不同的意見。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錯誤的人，不論錯誤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紀者外，一概不給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給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非黨員愿意参加整风运动，應該欢迎。但是必須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許随时自由退出。

(四)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許多领导人員脱离羣众的現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應該在全党提倡各級党政軍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农民

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一种永久的制度。我們党的领导干部在历史上长时期是同工农兵羣众同甘共苦的，这种密切联系羣众的优良作风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有許多同志在这一方面是退步了。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認識、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錯誤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揚我們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員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羣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內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谷架子，大大减少。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員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的办法，应该先从党內的少数人員作起。这种体力劳动，那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經驗之后，經過适当步骤，再有計劃地逐步地普及到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軍领导工作人員和經濟、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員。关于这个問題，需要規定一些具体办法，中央将另作专门指示。

(五)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首先从县級以上、軍隊团級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应该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可以同时选择若干基层党委进行整风学习，以便取得典型經驗，逐步推广。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各单位应该组织领导小组。党委的第一書記必須亲自負責。抓紧领导。整风計劃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則，并且必須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結合起来，同人民內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結合起来，防止关门

整风，妨害工作。整风的组织领导办法和具体工作计划，由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和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自己规定实行，并且希望于收到本指示以后两星期内能够将这种具体计划报告中央。

（选自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

这是为什么？

《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卢郁文在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

供了一些具体意見。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样不能不問：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見，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則就“不会饒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說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來說，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資料，使人民摆脱了剝削階級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己自手里，現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沒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滿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錯誤，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錯誤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們，都在积极地提意見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人民羣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時候，却有人把維護社会主义民主、維護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論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請想想他們所說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說他們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鋒队如此仇視的人們，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們所以認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

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

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选自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

工人说话了

《人民日报》社论

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地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工人阶级的舆论，正在吸引着全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注意。在这以前，有一部分职工曾经对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要求延长定息、撤销公方代表等问题表示过意见。现在，激起工人们发言的是性质更重大、范围更广阔的政治题目。在这一次，各地工人发言非常踊跃，情绪非常热烈。要求发言的工人很多，写信给报纸的工人也很多，报纸上发表的，不过是工人的意见的一小部分。很明显，广大的工人群众看出了，在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有一股歪风，这股歪风是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挑战的。觉悟的工人群众不能不起而应战了。

在近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善意的正确的批评，但是也有少数并不如此。这少数错误的意见企图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党的领导，而且发表这种错误意见的人，还力图造成一种空气，不允许人们加以反驳，甚至对于反驳者进行威胁。正是这种情况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愤怒，使他们在紧张的劳动中也无法沉默。

广大的职工群众看得清楚，如果听任这种右派野心分子飞扬跋扈，那末，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就将受到危害，社会主

义事业就将受到危害。职工群众了解，我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流血奋斗的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知道，在过去的长时期奋斗中，各种不同的人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态度，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多的信任，哪些人应该受到最少的信任。他们也知道，不管说话的人怎样说得漂亮，如果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工人群众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从各地职工座谈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充分感觉到，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对于自己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拥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也有意见，他们也要帮助党整风，帮助党组织改正错误，克服缺点。但是他们懂得，当有人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活动的時候，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一致，击退这些人的进攻。因此，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

最近有一种论调，仿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再不需要改造了。因而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工人阶级也没有什么值得学习，倒是工人阶级应该向资本家学习许多优良品质。但是话刚说完，事实的考验马上就来了。对于目前的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究竟是誰更能够鉴别，誰更能够采取坚决明确的态度？工人阶级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对于全国的知识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和有些大学教授是一种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种看法？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以煽动少数知识分子于一时，在工人和劳动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阶级的热情不但表现在英勇的建设的劳动中，也表现在对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坚决的斗争中。这

个事实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国家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且证明了，工人阶级有充分的觉悟和决心足以领导我们的国家。

现在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既然放手让资产阶级思想“鸣”，就不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鸣”，因为据说，工人阶级一“鸣”，就会妨碍别人“鸣”。怪哉！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还要等待别人给予言论自由！当然，这种论调是无法成立的。首先，工人阶级“鸣”了，并不是不允许别人“鸣”。工人阶级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别人也可以不同意工人阶级的意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谁也没有妨碍谁。其次，如果工人阶级一“鸣”，有力地驳倒了一些错误言论，使得资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再无理可“鸣”，那么，这种错误的言论受到一些“妨碍”，于国于民，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选自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

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 的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日报》社论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一九五六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一九五六年的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变革并没有遇到严重的抵抗。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村中，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迫切要求合作化，富裕中农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追随潮流，同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确实认识了合作化的利益。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促进了城市的社会主义高潮，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手工业也合作化了。由于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社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在一九五六年除了接受社会主义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出路。同时，资产阶级工商

業者經過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的严重斗争，多数人也大大减少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勇气。

至于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

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党派是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所以是民主党派。由于这种情况，解放以后，各民主党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治协商机构和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中都被给予相当的地位。它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或多或少地参加了一些革命的群众运动，并且曾经多次宣布它们拥护社会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大体上也类似民主党派。实际上，多数民主党派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它们的倾向一般也代表着许多无党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还多一种资本：他们的大部分直接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的种种部门需要着他们。

在各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界中，都有一部分右派，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唯一出路，并非不知道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为中国造成了一日千里的进步，没有社会主义，这种进步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是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有计划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广大人民的统一的利益和意志。这是他们所认为不能忍受的。因此他们决心要同无产阶级较量一下。

但是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活動家和知識分子，雖然確是痛恨社會主義，並且自信還有號召的能力，也並沒有在一九五六年的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豎起反社會主義的旗幟。首先，如上面所說，他們在全國人民中間是孤立的。他們不但不能動搖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的聯盟，也得不到工商業者 and 富裕中農的多數的支持。其次，就在各民主黨派中和資產階級知識界中，他們也處於少數的地位。在各民主黨派中，在資產階級知識界中，由於中國的歷史條件和共產黨對他們所採取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已經形成了一個轉入無產階級立場的左派，但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時辰還不太長，他們也還是一個比較的少數。各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知識界的多數，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還在動搖觀望於左右兩翼之間。他們還沒有放棄對於資本主義的依戀，但是他們也並不敵視社會主義。鑒於這種情況，資產階級右派在一九五六年決定按兵不動，等待時機。

按照右派分子的观点，對他們“有利”的時機總是會來的。匈牙利事件是他們的時機。毛主席報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又是他們的時機。一九五七年五月，共產黨決定整風，這對於右派分子當然更是好時機。於是他們向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向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發起了大舉進攻。他們攻擊社會主義的各種制度和政策，特別是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公開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並且要求共產黨下台。

資產階級右派的擁護社會主義的假面具撕破了，反對勞動人民的凶惡面目露出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同勞動人民的矛盾不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是敵我之間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曾經趨於緩和的階級鬥爭，由於右派的猖狂進攻，再一次尖銳化起來了。人民羣眾不能不堅決地徹底

地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人民羣眾認識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不隨之以政治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即是对敌視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進行堅決的徹底的政治鬥爭，直至他們投降為止。如果這一仗不打赢，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所謂政治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說取得政權。在我國，政權問題在一九四九年已經基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已經牢牢地掌握了國家的命脈，因此才有可能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右派分子的進攻證明，無產階級對於國家政權的領導，就某些方面說來，還不是鞏固的。無產階級對於某些國家機關和某些文教組織還沒有真正建立起自己的領導。對於右派分子，無產階級當然不可能實現領導，因為他們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對於中間分子，特別是受右派影響較深的那些中間分子，無產階級也只有一種不甚鞏固的領導。反右派鬥爭的重大任務之一，就是要在我們國家的一切方面把無產階級的領導鞏固地樹立起來。

所謂政治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是說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來，或者加以肉體上的消滅。反對右派分子的方法，仍然是羣眾性的辯論，仍然是擺事實，說道理，把右派分子一一地駁倒。我們國家的情況不需要對右派採取極端的政策。我們要堅決粉碎右派的進攻，我們也要使一切願意真誠悔改的右派分子得到改造的機會，尤其是要使廣大羣眾在反右派鬥爭中得到教育。

使廣大羣眾在反右派鬥爭中得到教育，這裡包括左派和中間派。對於左派，是要使他們在鬥爭中提高覺悟和受到鍛煉。對於中間派，是要使他們在思想上同右派劃清界限，克服自己

在資本主义立場和社会主义立場中間动摇不定的两面性，是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有一部分从中間派归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所謂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就是对中間派說的。

中間派是可以同无产階級合作的，也是无产階級必須爭取的，但是他們同无产階級之間有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应当按照“**团结——批評——团结**”的公式去解决。

所謂中間派，就是动摇于左派和右派之間、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革命和反动之間的人們。左派和右派都是坚决的，而中間派是不坚决的。就全国人民來說，左派是絕大多数，中間派是少数，右派更是极少数。但是就目前的知识界的情况說來，如前面所說，左派暫時也还是比较的少数，多数还是中間派。中間派可以跟着右派走，也可以跟着左派走。右派之所以敢于进攻，就是由于中間派的存在，就是由于右派还有可能同左派爭夺中間派。因此，不解决这一部分人的政治立場問題，反右派斗争就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知识分子是为一定的經濟基础服务的，他們同經濟基础的关系，好比毛同皮的关系。現在，旧的資本主义的經濟基础已經灭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上开始新生活，就是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否則，知识分子就会成为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目前的中間派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向左轉，不向劳动人民靠攏，就多少类似这种“梁上君子”。这是过渡时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他們虽然并不坚决拥护資本主义，但是毕竟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他們对旧世界还有留恋，对新社会还有些生疏，常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之感。当然，这种现象是不会持久的。

他們或者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經過一段時間，終將站到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方面來。同樣，城市中的工商業者，農村中的富裕中農，多數在目前也在動搖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無產階級、廣大的勞動人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要團結一切還處於中間狀態的人們，幫助他們盡量縮短動搖的時間。為了團結中間派，就要堅決反對右派，並且批評中間派的動搖性。思想革命就是要革掉他們的動搖性，使他們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工商業工作者和社會主義的農民。

目前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發展成為全民性的鬥爭。這一場鬥爭對於粉碎右派，教育中間派和社會上的一切人，都具有偉大的決定的意義。當然，一次鬥爭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為了完全解決問題，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在經濟戰綫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我們有更好的條件來進行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又將反過來促進和加強經濟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加速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的建立。目前我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這是右派還敢於進攻和中間派還在動搖的一個客觀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鞏固。爭取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面勝利，這是我國人民在整個過渡時期的偉大歷史任務，它將還需要經過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全國的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革命知識分子和全體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人民應當團結一致，加緊努力，改進工作，為儘快地和儘可能完滿地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建成完全鞏固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 選自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附 录：

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57年4月27日）

刘少奇

同志們：市委要我向同志們講講話。我和市委的同志們談了一些問題。最近时期，我到几个地方去跑了一下，跑了五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同这五个省的同志都談过，也找过一些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談过一下，当前的問題，毛主席作过报告的，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这个問題，我現在也來談談这个問題。現在就我所感觉到的，以及同市委的同志們談話中間所提出来的一些問題，講一講。現在你們对这个問題正在討論。討論中有很多意見，有一部分意見的摘要我已看过了，对于某些意見，我可以談一下。

（一）

什么是國內的主要矛盾？听說有很多同志在討論这个问题：現在國內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國外的主要矛盾大家都清楚了，不要講了。現在就是我們國家內部的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問題應該这样提法：到現在的时候，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現在在我們國內是不是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現在恐怕不能这样講了。現在國內敌人已經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階級早已消灭了，資產階級也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还剩下一点残余，剩下一点尾巴，所以不能說現在在我們國內敌我矛盾还是主要

的。也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少数反革命分子要提高警惕，他还可以作乱的，还可以进行破坏活动。地主阶级的残余也还在农村里面，也有些人还是要作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中也有一少部分人还是不服气的。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性，丧失警惕性，麻痹警惕性是不对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那就是说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矛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党的八大讲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这些矛盾都基本解决了，那么现在什么矛盾是主要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已经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可以这么说。文章上面这样写了，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大量的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大量的表现或者集中的表现、主要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那么，自然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就答复了。

那么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说，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的说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某种条件之

下，也可以轉化为对抗性的。这里特別注意一个条件，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轉化为对抗性的，特別在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如果我們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处理不好，处理錯誤了，本来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結果也变成为对抗。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条件之下，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发展成为对抗的。其他某些个别的情形也有对抗性的，如一个人打死了人，杀人犯之类，刑事犯罪，违法乱紀，这些情况，虽然在人民內部是个别的，然而也是不断的会有所发生的。这些矛盾你能說是不对抗的嗎？那也很难講。但这些是个别的情况。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在个别的情况之下，有这种对抗性。但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一般的講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

因此，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應該是什么方針呢？矛盾的性質是非对抗性的，那么处理的方針就不要以对抗的办法来处理，也是要用非对抗的办法处理。是什么性質的矛盾，就用什么方針、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个矛盾。既然是非对抗的矛盾，处理的方法、处理的方針就不能用对抗的方針，而應該采取从团結出发，經過批評或斗争，达到团結的目的，就是团結——批評——团結这样的方針，这不是处理对抗性矛盾的方針。处理对抗性的矛盾不能用这样的方針。团結——批評——团結的方針是处理非对抗性矛盾的方針。处理对抗性的矛盾不能用这个方針的。这个方針就是強調同一性。矛盾有两方面，矛盾的两重性：有同一性，有斗争性。处理的方針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它原来是有同一性的。強調同一性，而不是強調斗争性，只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中間不是有一个批評或者斗争嘛，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而这个斗争也是为了团結。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結，批評的目的是为了团結，为

了加强团结、巩固团结。所以处理方针是强调同一性，不是强调斗争性。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斗争性，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必要地紧张起来，没有必要地激烈化起来，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势，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与处理敌我矛盾有不同的方针。处理敌我矛盾是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斗争激烈化，以致于把矛盾的对方压倒，消灭，这是处理敌我矛盾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不是采取这样的方针呢？是不是也是使矛盾紧张起来，使它激烈化，压倒对方，甚而至于进一步把对方消灭呢？不能这样！很显然，如果采取那样的方针，那我们就要犯错误，这就是基本方针上错误了，基本态度上是错了。

在你们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主要矛盾呢？有人说，今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话对不对？我看这话也对，也可以这样讲。今天我们国内的矛盾，的确是无产阶级思想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但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照这个提意见的同志的想法，我估计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群众、工人、学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干部、我们领导者、我们厂长、我们校长、我们政府的负责人，是无产阶级思想。大概他们是这样想的。人民群众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我们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思想，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这样讲，我看就错了。

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就是我们党内的矛盾。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干部中间，或者说你们在座的那一个人的脑子中间，是不是有点非无产阶级思想？你们脑子里尽

是无产阶级思想？一点非无产阶级思想都没有？有没有那么一点？你们那一个可以担保说我的脑子里面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点没有？你们在座各个同志的脑子里都有若干非无产阶级思想，有些人并且还不少。那么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在你们自己脑子里就矛盾起来了。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这种情形。人民群众中间当然也有很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工人阶级、人民群众里面就一点没有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恐怕也不能那样讲。我们党内有很多问题，主观主义是什么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争名夺利是无产阶级思想？评级的时候升了两级，还睡了不起来，那是无产阶级思想？所以说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今天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必须我们大家研究来加以解决的问题，那么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部解决，而且要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间先来解决，要把我们共产党干部中间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搞掉一点。

用什么办法搞掉？我们党内干部中间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用什么办法来跟它斗争，来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减少？用大民主的办法好不好？还是用小民主的办法？用解决敌我斗争的办法好不好？还是用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这个办法？那时候你们觉得用小民主的办法你们都受不起，为什么要对我批评，最好一点民主都没有。因此，我们觉得关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问题，要这样分析，要这样看：现在在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个人主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在我们党内、干部中间，是比以前搞得

更少了，还是更多了一点，发展了一点？如果說是更多了一点，那我們就有一个任务，就要把这个东西整少一点，总要越搞越少才好，越搞越少我們才会进步。

因此，就是講无产階級思想与非无产階級思想的矛盾是主要的，那么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首先就是共产党內部的矛盾，不是什么敌我矛盾。在今天我們中国的情况之下，就是說在帝国主义已經赶走、地主階級已經消灭、資产階級已經基本上消灭的条件之下，无产階級思想与非无产階級思想的矛盾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表現在人民內部，而且也表現在共产党內部，表現在我們共产党的干部中間。所以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是也有階級性？当然有階級性的。非无产階級思想有农民階級思想、小資产階級思想、資产階級思想，今天还有地主階級思想。这些思想是反映过去的階級的思想情况，不是、或者大部分不是反映今天的。今天的农民是新的农民了，今天的資本家也是新的資本家了，今天的城市小資产階級跟农民是新的了，是合作化了的农民和小資产階級了，今天的資本家也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資本家了。如果我們講非无产階級思想，講到农民階級的思想，講到小資产階級的思想，地主階級的思想，是講过去的，是反映了那个階級存在的时候。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階級的問題，但是这是反映在人民內部。

有人說，今天我們中国国内的情况，工人階級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如果說工人农民有矛盾的話，也應該說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因为工人階級是人民，农民也是人民，工人与农民的矛盾难道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你說是敌我矛盾？而且今天的农民，刚才已經講了，已經不是过去的农民，已經在起变化而且基本上已經起了变化，他已經合作化了的农民，已經

式新的农民。今天来讲农民阶级，这阶级二个字是值得考虑了，他已是集体化的农民了。所以工农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人說，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刚才已经讲过，曾经有一个时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曾经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也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外，他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了，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之下，矛盾就转化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曾经有对抗性的，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讲，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的，因为这是八大决议上讲的。如果有人这样讲，因这是八大决议上面讲了的，你说我不赞成，当然赞成。但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的上层建筑是什么？上层建筑是谁？谁在代表上层建筑？今天的国家谁来代表？是不是在座同志们都代表一下子国家？那么你们就是上层建筑，你们就是代表国家，当然包括我、我们。我们、你们代表国家，共产党就代表国家。其它的上层建筑中间还包括思想、文化艺术、报纸这些东西。这些上层建筑就是今天的国家、政治、文化，这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你能说是敌我矛盾？代表上层建筑就是你们，就是我们，你说我们不算人民，算敌我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今天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所有制是什么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现在分配关系里面表现矛盾最多了，那

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間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內部的矛盾，是全民所有制內部的矛盾，是集体所有制內部的矛盾，这也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先进与落后，这也是人民內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些矛盾，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这些矛盾在过去曾經是表现为敌对阶级之間的矛盾。过去是反动阶级代表落后，而革命阶级代表先进，是阶级矛盾，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过去的上层建筑曾經是反动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曾經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地主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曾經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所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曾經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国内形势有了根本变化，现在这些矛盾表现为人民內部的矛盾。现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现在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现在的先进与落后，表现在人民內部，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間，而是表现在人民內部。这是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經被消灭，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这个情形变了，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內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永远都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永远都有这个矛盾，到一万年以后还有。

还有人說，人民羣众与领导者之間的矛盾，或者說人民羣众与官僚主义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的，也可以說是大量表现或者集中表现在人民羣众与领导者之間，表现在人民羣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的。这样講大体上是对的。那末人民羣众与人民羣众的领导者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还是敌我矛

盾？在座的同志們都是領導者，人民羣眾與你們的矛盾你說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如果是敵我矛盾，誰是敵人？是人民是敵人，還是你們是敵人？就發生這個問題。人民羣眾與官僚主義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人民羣眾與我們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之間的矛盾，可不可以這樣講，一般的講來，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所謂基本上、所謂一般講來，是除開了一種特殊情形，除開了特別惡劣的官僚主義、頑固的官僚主義、反人民的官僚主義、違法亂紀、大貪污犯等等一小部分少數人以外，一般的犯了官僚主義錯誤，人民羣眾就不贊成他，就要反對他，這個矛盾到底是什麼矛盾？是不是算人民內部的矛盾？還是算敵我矛盾？恐怕要算人民內部矛盾才好吧！如果不算人民內部矛盾，那麼我們要受不起，在座的同志，恐怕你們也受不起吧？還是要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才好，這樣你們才好辦，不然，就不好辦。恐怕這種官僚主義，我們做領導者在目前情況之下，多多少少總要犯那麼一點，完全沒有官僚主義，恐怕這個事情是很為難的。我就有不少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這個東西，在目前中國的情況之下，幾乎是很難完全避免的，領導機關、領導者，稍稍要犯一些的。每一個人，我們共產黨的每一個幹部都值得檢討一下，檢查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義？說“我沒有官僚主義”的那種人，你不要相信他，恐怕這種人官僚主義還更多。當然惡劣的、很頑固的、與人民羣眾完全對立起來的官僚主義還是少數。但是在某些情況比較嚴重的、已經引起人民反對的這種官僚主義，現在已經不少，不是很少，而是相當多，在各个方面都有。

另外還有同志說，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矛盾是什麼矛盾？是不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是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如果講唯

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講思想問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呢？从思想上講是对抗性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对抗性的，是不可調和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可不可以調和呢？我看是不可調和的。两个主义的体系是不能調和的。唯心与唯物是不能調和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非真理，是謬誤。真理与謬誤，是与非中間的矛盾是不是对抗的？我看是对抗性的。因此我們說要辨明是非，要把是非辨明白，是是还是非，要辨明白；不是說把是非調和起来，不是說調和是非，而是說辨明是非，所以是非不能混淆起来，而是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不是混淆是非，不是調和是非，是辨明是非。要寻找真理，把謬誤去掉。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謬誤，是与非，这些从思想上講是不可調和的，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

但是唯心与唯物曾經表現在敌我階級之間，敌对階級之間；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謬誤、是与非，曾經表現在敌我之間，敌对階級之間。在以前，帝国主义是唯心，革命者是唯物；真理是革命者的，謬誤是帝国主义，是蔣介石，是地主階級，或者是資本主义的拥护者，发国难財的，发橫財的。帝国主义、地主階級、蔣介石他們是非，而革命者方面、人民是是。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謬誤，是与非，曾經表現在敌对階級之間。所以这种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謬誤、是与非之間的矛盾，它的对抗，表現在階級之間的对抗，表現在敌我之間的对抗。而今天，帝国主义已經被赶走了，蔣介石被打倒了，地主階級已經消灭了，資產階級問題也解决了，那么是不是还有唯心与唯物、还有真理与謬誤、还有是与非？还有。那么表現在什么中間？它表現在人民內部，不是表現在敌我之間，不是表現在敌对階級之間，而是表現在人民內部。人民內部有唯心主

义跟唯物主义两种思想，人民内部有些人是有真理，有些人是謬誤的，人民内部有是有非。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情况变了，这些問題不表現在敌我階級之間了，而表現在人民内部了。因此，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思想上來講是对抗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着这些矛盾表現在敌对階級之間的时候，我們采取对抗的办法，采取打倒的办法，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来解决唯心与唯物問題，解决真理与謬誤問題，解决是非問題。你看我們只說帝国主义就是非，不說帝国主义还有什么好处，还有什么是，我們只說蔣介石是王八蛋。当着唯心主义表現在敌我階級之間的时候，譬如胡适，我們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我們对蔣介石是一棍子打死，对帝国主义是一棍子打死，对胡适也是一棍子打死。当着这些問題表現在敌对階級之間的时候，我們解决办法是采取对抗的办法，打倒的办好，一棍子打死的方法。而当着今天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謬誤、是与非的問題表現在人民内部，那我們解决的办法是采取什么？要采取和风細雨、小民主、小小民主，而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是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采取和风細雨的办法。如果不是采取和风細雨的办法，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問題，解决党内的思想問題，这是錯誤的。过去我們党犯过这个錯誤。在教条主义統治的时候，对于我們党内的斗争也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現在我們是不是还要采取这种办法？現在我們大家总是有点不服气，說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不大服气，总想要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这表現了很多同志們的心情。我看提出这些問題，他們的心里焦急了，来反对党現在所提出的这个方針，不贊成这个方針，要和党来比。那么我就問你，唯心主义在你們脑子里有沒有？特别是提

出這些問題的同志們，他腦子裏有沒有？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義？他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一點謬誤也沒有？他的就是是，一點非也沒有？如果說在我們黨內同志們還有主觀主義的話，而主觀主義是什麼東西呢？主觀主義就是唯心主義嘛？恐怕提問題的人教條主義更多。教條主義是什麼？教條主義就是唯心主義。提這些問題的人，他的腦子裏有不少的唯心主義，不少的非真理，不少的謬誤。我問你，那一棍子打死好不好？在你們腦子裏有唯心主義，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也是對抗的，不可調和的，那就一棍子打死好不好？你們有教條主義的時候我們就一棍子打死，你們有經驗主義的時候也一棍子打死。那你們就不贊成了。打別人可以，打自己就不贊成了。因此，要推己及人。當着你自己腦子裏有唯心主義的時候，你不願意人家採取粗暴態度來對待你，那末當着別人腦子裏有唯心主義的時候，你也不要採取粗暴的態度去對待別人。推己及人嘛！我看這樣比較好。如果採取粗暴的態度來解決思想問題，那就是很不好的。我們曾經有過經驗，打來打去，打的一塌糊塗，問題還是解決不了。一棍子打死的方法，結果我打死你，你打死我，問題還是解決不了。我們過去也有過經驗的。

所以，在目前什麼是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可以答复說：人民內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剛才提出這樣多問題，我已經講過了，這些問題可以這樣講，也可以那樣講。這些問題都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什麼是主要的，下面我還要講。

這裡有一個問題，矛盾有對抗性的矛盾，有非對抗性的矛盾。矛盾是一切，一切都有矛盾。世界就有矛盾，全部世界，整個世界，是一個矛盾的世界，一切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基本上帶對抗性的矛盾，另一類是基本上不

帶對抗性的矛盾，所以要分為兩類，矛盾有這兩類，這是客觀存在。客觀上存在這兩類矛盾，一類是帶對抗性的，一類是非對抗性的。因此，處理矛盾的方法，也有兩種方法。處理帶對抗性的矛盾是一種方法，而處理非對抗性的矛盾又是另外一種方法。如果我們把對抗性的矛盾當作非對抗性的矛盾來處理，那是錯誤的。本來一個矛盾是對抗性的，如果我們把它看成是非對抗性的，因此我們處理也是當作非對抗性的矛盾來處理，那我們就要犯錯誤。比如修正主義就是這樣。修正主義強調勞資合作。本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在歐洲那些國家，在西方國家是對抗性的矛盾，而社會民主黨人說西歐那些國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非對抗性的，主張勞資合作，主張經過改良、把資本主義改良一下就可以變為社會主義，就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那就是說，他把對抗性的矛盾看成非對抗性的矛盾，而處理又是不強調階級鬥爭，而強調階級妥協，強調用妥協的辦法，來實行社會主義，來消滅資本主義。所以他們犯了錯誤，基本上犯了路線錯誤。這是一個例子，這種例子還多得很。把對抗性矛盾當作非對抗性矛盾來處理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把非對抗性的矛盾當作對抗性的矛盾來處理，也是錯誤的。本來這個矛盾不是帶對抗性的，但是我們把它看作有對抗性，看作是對抗性的矛盾，而處理它的時候又採用那種處理對抗性的矛盾的辦法來處理，那我們也就要犯錯誤。比如托洛斯基主義，曾經說工农矛盾是對抗性的，托洛斯基曾經主張壓榨農民來建設社會主義。本來工农之間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他把它看成是對抗性的，而處理的方法用處理對抗性的矛盾的方法來辦。我們有些同志把人民內部的矛盾，當作對抗性的矛盾來處理，把人民羣眾當敵人。本來是人民羣眾內部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該應採用非對抗性的辦法來處理，但是他把人民羣眾當

作敌人，采取一种压制的办法，当作对抗性矛盾来处理，这就基本上犯錯誤。比如我們党内对犯錯誤的人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本来，一般講来，党内的矛盾，除开如陈独秀、托洛茨基派、张国焘之外，一般的党内意見不同、主张不同，那是党内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辯論中間，不允許对別人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如果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这就犯錯誤。

因此，首先是認識矛盾，把矛盾認識清楚，要具体研究，具体审察，具体分析，对于問題来了，看这种問題，这种現象，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确定它是对抗性的矛盾，处理方法就不同；确定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办法又不同。認識矛盾，而后决定处理的方法、处理的方針。对矛盾認識不清楚，矛盾的性質确定錯了，那末处理方針也要犯錯誤；处理方針錯了，那就一系列要錯，一系列的具体办法要犯錯誤。我們說人民內部矛盾一般講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般講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那是根本方針上面犯錯誤。当然，事情是复杂的，这两类矛盾可以互相轉化的，对抗性矛盾会轉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也会轉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轉化了，处理的方針也要随之轉化。比如我們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我們党内犯机会主义錯誤的人，曾經在一个时期是非对抗性的，后来可以轉化为对抗性。比如陈独秀主义，陈独秀主义老早就存在的，在党内曾經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同他辯論的，可以允許在党内解决。果然我們党内曾經有很多同志犯过陈独秀主义錯誤，后来轉化了，后来改正了；但是有那么一部分人犯了陈独秀主义錯誤死

硬不改，坚决不改，坚持并且在党里面进行分裂活动，组织另外的派别，组织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在那一个时候，进行分裂活动，组织一种特殊的派别，在党内，那个时期陈独秀机会主义就变为对抗性了，变为对抗性矛盾了。王明路线，是党的一个机会主义路线，我们批评了这个路线，改正了这个路线，但是还没有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一直到现在，虽然王明同志还没有承认错误，到第八次大会，他还没有承认错误，但是他还没有搞分裂活动，也没有反党、跑到敌人那里去，所以这个矛盾，还是没有变为对抗性的，还是党内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立三路线，是党的非对抗性矛盾。刚才讲了，就思想上讲，就是非问题来讲是对抗性的，但是他表现在党内，表现在无产阶级的内部，党的内部。李立三不是敌对阶级的代表，不是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而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内部。张国焘曾经是非对抗性的，后来跑到敌人那里去了，那还不是对抗？还有一个高岗，但高岗不同。上面谈的派别是用一种纲领来争取同情，来取得党的领导权，而高岗则是进行阴谋活动，是另外一种性质，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他改正错误，不进行阴谋活动了，那还可以转化。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讲党内。人民内部一样，人民内部问题，例子可以举得很多，就是说，在一种特殊条件之下，两类矛盾可以互相转化，原来对抗性的，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例如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原来根本上是带对抗性的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但是后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了，它可以和平改造了。其他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共产党并不是一种斗争的嗜好者，并不是嗜好斗争，而是那个矛盾非斗争不可，不可调和，是对抗性的矛盾，

要去解决对抗性矛盾，就要強調斗争。我們并不是嗜好斗争，这是观客决定的。当着矛盾可以不用对抗的办法，可以轉化为非对抗性的时候，我們就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的办法来解决矛盾，但是問題是要解决矛盾。我們共产党一方面不是斗争的嗜好者，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那共产党是不吝惜斗争的，可以斗争的。但决不是我們主观上喜欢斗争，凡是可以用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总是用比較和緩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在我們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不用对抗的办法，可以不用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可以用小民主的办法，可以用和风細雨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因此我們主观上沒有必要去強調斗争，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来制造斗争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們才舒服，好象我們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癮。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不是主观愿望决定的、是看客观矛盾的性質，看客观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矛盾是不是可以解决。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采取說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的时候我們都是采用說服、教育的办法来解决，就是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因此現在說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有危险？是不是一說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好象就会斗得一塌糊涂了，那不会的。我們就是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那么斗，主张用和风細雨，主张搞点小民主，因为这是非对抗性的。这是講的第一个問題，就是你們提出来的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問題。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摘录）

費孝通

我想談談知識分子，談談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學校里教書的老朋友們的心情。所談的无非是一隅之見，一時之感；寫出來還是雜文之類的東西而已。

.....

春到人間，老樹也竟然茁出了新枝。

這個感覺並不是回到了北京才有的。去年暑假，我初到昆明，曾會見過不久前為了箋注杜詩特地到成都草堂去采訪回來的劉文典老先生。去年年底，張文瀾先生邀我去吃小館子送行，大談他正在設計中的排字機器。這半年多來，知識分子的變化可真不小。土隔三日怎樣不刮目而視？

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幾年來，經過了狂風暴雨般的運動，受到了多次社會主義勝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積月累的学习，知識分子原本已起了變化。……接着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但是對一般老知識分子來說，現在好象還是早春天氣。他們的生氣正在冒頭，但還有一點靦腆 自信力不那麼強，顧慮似乎不少。早春天氣，未免乍寒乍暖。這原是最難將息的時節。逼近一看，問題還是不少的。當然，問題總是有的，但當前的問題畢竟和過去的不同了。

前年年底，我曾到南京、蘇州、杭州去走過一趟。一路上也會到不少老朋友。在他們談吐之間，令人感覺到有一種寂寞之感：當一個人碰到一桩心愛的事而自己卻又覺得沒有份的時

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这些老知识分子当他们搞清楚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得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心上怎能不浮起了墙外行人的“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

去年下半年，我一直在西南一带东跑西走，在朋友中听到的这种感叹是不多了。……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窠，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知识分子这种心情是可喜的，这是积极因素，蕴育着进步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些知识分子当前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概括地答复这个问题是有困难的。我只能就比较熟悉的一部分朋友们这个范围里来捉摸捉摸。新年里报纸上曾发表过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年愿望。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先生说得很干脆：要做一个专任教授或者专任研究员。做了教授之后要什么呢？在成都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康振黄教授总结了在座许多朋友们的心愿：“一间房，二本书”，意思是要能静静地做做功课。

要体会这些要求，得说个由来。一年多前知识分子苦恼的是有力使不上；一年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感觉到自己力量不足，要求提高。

.....

应当說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基本的，但是現在这已不是重点了。針對知识分子的要求來說，現在主要是要幫助他們提高业务。先談談他們的业务情况罢。在教学改革初期，教師們曾經紧张过一陣。那是由于要学习苏联，很多教材都要新編，又由于經過思想改造运动，許多教師們把原来学来的一套否定了，而新的体系沒有建立，有些青黄不接。所以突击俄文，翻譯講义，显得很忙。这两年来，是不是学习苏联已經学通了呢？是不是新的学术体系已經建立了呢？我想并不都是如此。但是上課的困难似乎确是比較少了。那是因为一方面教師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講义也編出了一套，上堂照本宣讀，問題已不大。但是到了去年，却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反教条主义的結果，对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培养能独立思考的学生，老师自己先得独立思考一番。过去和教本不同的說法，不論自己信与不信，可以閉口不談，現在得講講各家的异同，那就免不了要批判批判，如果自己沒有鑽研过，道理也就說不明白。过去可以口头上复述一些心里不太同意的理論，現在心口不一致，連自圓其說都有难处了。过去可以根据权威对那些自己連原書都沒有見过的异說，跟着大加駁斥，現在別人一追問就会露馬脚了。总之，現在沒有一點真才实学，教書这个行道是不容易搞了。反教条主义能提高教学質量的道理在此，引起教師們业务上的紧张的道理也在此。

我所接触到的許多朋友們，对反教条主义是拥护的，对自己提高业务的要求也是积极的，他們要求帮助也是真实的。要“一間房、二本書”靜靜地做做功課就是指这个。說得具体一些，他們要求开展科学研究，要有机会出席学术性的會議，甚至要脫离生产进修一个时期，和出国留学，等等。这种要求是好的，应当說是可貴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实际情况，帮助教师們提高业务的科学研究开展得怎样了呢？有的学校好些，有的学校差些，总的說来，我認为并没有滿足教师們的要求。

如果研究一下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不够令人滿意的情况，关键問題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好呢？我看并不如此。教师們工作条件在过去半年中是有很大改善的。首先說过去吵得最凶的时间問題。自从規定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之后，各地高等学校想了很多办法来貫徹，效果是不坏的。去年上半年，北京的高等学校里大約已有四分之三的教师得到了保証。8月里我到昆明，听說云南大学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教师还不能保証业务时间。今年年初我知道有些学校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証的教师比例已降到十分之一以下。这个問題虽則不能說全部解决，而且像李达先生在新年展望中所提到的情况还是存在，这些业务时间得不到保証的人又多是有能力搞科学研究的，但是一般說来时间問題已不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障碍了。其次，图书、資料、仪器、设备的条件怎样呢？这些条件各地、各校是不平衡的。过去一年中，各校購置图书一般都有增加，現在的問題主要不是書少，而是編目慢、流通难，分配还不够合理。仪器方面在生产、供应、修配、使用上問題还多，特别是内地和边区的学校困难不少。但过去一年中，我們在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少的。除了特別的专题外，一般还没有发生有人因为这些方面的条件缺乏而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

那么現在高等学校里的教师們在开展科学研究上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呢？我認为是具体领导不够。在这半年的旅行中，我看到：凡是加强了对教师們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这些学校里的教师們也就安心工作，业务有提高，学生也滿意；凡是放松了这方面领导的，教师們徬徨苦悶、情緒也多。这种区别是

可以理解的。教師們當前積極要求提高業務，一有奔頭就心安理得。如果積極性起來了，有了要求，不能滿足，看不到用力的方向，心就亂了。

全國各高等學校里科學研究工作開展得怎樣，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沒有把科學研究工作認真領導起來的學校還是不少的。有些學校把“向科學進軍”當運動來搞，做了號召性的動員報告之後，發表表格要教師們填題目，造計劃，甚至過了一個時候就伸手要成果。在高等學校里究竟應當搞些什麼研究？科學研究和教學怎樣結合？各科抓些什麼問題？教師之間又怎樣組織起來，分工合作，互相幫助？進行研究時要什麼具體條件？工作中遇到了困難怎樣幫助克服？怎樣組織討論來提高學術思想？——這一系列的問題顯然不是任何一個教師能單獨解決的。在這些問題上都須要具體領導。如果學校領導上不深入實際，依靠科學研究上有經驗的教師，逐步地跟着工作的發展，解決這些問題，教師們儘管主觀上怎樣積極，科學研究工作不是開展不起來，就是搞得有些混亂。我就遇到過已經填過幾次科學研究計劃表的朋友，見了我還是說科學研究方向不明，題目難找，甚至有些連自己在表上填過些什麼都不大清楚了。對於這些朋友，向科學進軍真像一陣風，只“吹皺了一池春水。”另外還有些朋友，急于趕世界水平，對實際條件考慮不夠，一動手首先和已有的教學任務碰了頭，時間衝突，精力兼顧不來，發生了矛盾。我又注意到有一些學校領導上對第一種情況倒並不焦急，按兵不動，但求完得成當前教學任務就滿意了，而且科學研究表格已匯報了上級，交了卷了，他們對於第二種情況卻相當敏感，惟恐教學任務受到影響。他們不去分析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的，更少自覺到這正是缺乏具體領導的結果；反而大叫教學和科學研究有矛盾，教師們名利心重，輕教

重研。好像为按兵不动，填表了事，找到了正当理由。这种叫喊对教师们的积极性是不利的，上推下拉，进退两难，他们思想上怎能不混乱，情绪上怎能不受波动？高等学校里怎样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一下是必要的。如果真的在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和教学有矛盾，不能放手开展科学研究，也得拿出个提高教师们业务水平的具体办法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但总觉得解决的办法，不是在冻结科学研究、保证教学，而是在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导，密切和教学的结合。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搞得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检查一下的。

知识分子提高业务的积极要求反映了他们自己觉得业务水平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这种自觉表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已有了提高，是过去几年思想改造和学习的效果。如果他们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旁观者，他们为什么要不到午夜不上床的自苦如此呢？我想强调知识分子搞科学研究是为名利双收，是个人打算是不好的，因为和事实不符。

接着想谈谈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唯物和唯心的界线弄不大清楚，只有简单地划一下，说凡是资产阶级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心的，凡是社会主义国家里讲的学术都是唯物的。如果这条线划对了，事情是容易办些。英美的书本占书架，当废纸卖掉；俄文来不及学，就买翻

譯的小冊子來讀。寫文章、上講堂多引幾句引經據典的話，找幾個英美學者罵上一番。這些都好辦，而且很多人是這樣辦了。但是學習了一些証辯唯物主義之後，逐步會覺得這樣簡單的劃法，似乎是很成問題的，覺得有一點像小孩子看草台戲，劇情看不懂，就看白臉還是紅臉，白臉挨打了就叫好。他們逐步明白過去那樣以為那些人說的話一定是唯物的，那些人說的話一定是唯心的想法不很對頭的。他們開始要求從學術思想本身來辨別唯心還是唯物。我想這應當可以說是學習上進了一步，但是這步一進，問題卻多了，心情也跟着複雜起來了。他們很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自己的學術思想里究竟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但是在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之前，卻還沒有這個條件。

積極的東西搞得不好會變成消極的東西。要求搞清楚唯物唯心的界綫應當肯定是積極的，但是如果條件不具備，這種要求不能滿足，別人還是紅臉白臉地來對待他，他心里就會不服氣，會產生情緒。我体会到學習蘇聯這個問題上就有這種情況。最初確是有人反對學習蘇聯，本質上是立場問題。但是最近又出現一些對學習蘇聯的態度不滿的情緒，如果不加分析，會覺得立場又不穩了，其實性質是和過去不同的。在過去一段時間里確有一些地方把學習蘇聯簡單化了。有些蘇聯傳來的東西不一定是正確的，有些人提出了懷疑或不同意見，反而受到批評，於是搞出了情緒。這些情緒並不是從立場問題上發生的。但一有情緒，消極因素也跟着滋長，那就不好了。

百家爭鳴恰好解決當前知識分子思想發展上發生出來的這些問題。據我的了解，百家爭鳴就是通過自由討論來明確是非，即是知識分子進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觀點、方法上更進一步的接受辯証唯物主義。現在極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有接受辯証

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們希望具体地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們欢迎百家爭鳴，因为百家爭鳴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給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样，可以防止积极轉化为消极，而使知识分子的潜力充分發揮出来。

“百家爭鳴”的方針貫徹得怎样了呢？和“向科学进军”来比較似乎又差一些。先从知识分子方面來說：他們对百家爭鳴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別人爭，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說，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來說，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这一年来，情况是有些好轉，在一定場合之下，有些人是肯吐露些知心話了。但是还是相当靦腆的。向科学进军可以关起門来进，而百家爭鳴就得抛头露面来鳴，靦腆就鳴不成。

究竟顧虑些什么呢？对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說話，抱了書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貨，別人莫测高深。抛头露面，那就会显原形，說穿了这里还有个“面子問題”。面子問題并不是簡單的。我記得有一次座談会上有一位朋友說得很生动，他說，我不是怕挨批評，我們以前还不是大家有被批評的，学术論战还是搞过，現在可挨不得，因为一有人說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課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軟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帶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宮，一直会影响到物質基础，因为这是“德”，評薪評級，进修出国，甚至談戀愛，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現在是正在轉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

一下就轉得過來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虧”的思想還沒有全消的知識分子，想到了不鳴無妨，鳴了說不定會自討麻煩，結果是何必開口。

另一方面是具體領導知識分子工作的人對於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的是一上來都有些擔心。“中央定的方針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我們這裡具體情況還沒有條件”。受着有些人想把這個方針圈個範圍：先圈在學術里，再圈在教學之外，這樣一來就可以不出亂子了。等到鳴了起來，聞到一些唯心主義的氣味，就有人打起警鐘：“唯心主義泛濫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又冒頭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鎮住了，這石碣一搗開，又會沖出來，搗亂人間的樣子。對這方針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對這方針不太熱心，等着瞧瞧再說的人似乎並不少。

“草色遙看近却無”——這原是早春天氣應有的風光。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意味着他們的積極性是動起來了，特別表現在提高業務的要求上，但是消極因素還是很多的。他們對百家爭鳴還是顧慮重重，不敢鳴，不敢爭；至於和實際政治關係比較密切的問題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點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神氣。比如說：波匈事件發生時，我正在邊區旅行，沒有直接聽到當時高級知識分子的反映，但是去年年底回到城市里和朋友談起了這些事，我的印象是這樣大的事情在高級知識分子中引起的波動卻是不大的。一方面這是好的，說明我們的這些知識分子立場是穩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細了解一下，可以看到他們並不是思想上是非辨別得很清楚所以很穩，而是沒有深刻地動過腦筋，古井沒有生波，不很關心。

我想，對世界的和國家的大事不關心可能是當前許多高級知識分子的一般情況。種種情況當然不是新發生的，由來已

久。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同聊天，談起了为什么很多朋友不关心政治。有一位朋友說得很有意思。他說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是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想法，認為国家大事自有賢能，自己可以不必操心。大家的确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錯不到那里去的，很放心，只要好好跟共产党走，把自己崗位工作做好了，就是了。其次是很多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不必等別人批評，自己常常会問問自己是不是旧思想又在冒头，所以对于世界大事或是国家大事自己没有个看法和主张，等等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論才动脑筋。第三，对世界大事，自觉很孤陋寡聞，不要說別的，連很多外国人的名字說起来都觉得繞口。情况不熟悉，要动脑筋也沒有資料。第四，年来养成了沒有布置就不学习的懶汉习惯。我們曾經想替这些思想配个帽子，是但配来配去头寸都不很合。說信任党、接受领导不对么？当然不可以这样說。但是怎么会信任得成了依賴了呢？虛心些也是好的，但是怎么搞得沒有了主张了呢？不論怎样，总的看来，对国家的事情关心不够总是消极性的东西。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思想情况的呢？这些思想情况又說明些什么呢？我們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自認水平不够，說不清楚。我們似乎觉得这里是不是反映着这些知识分子觉得問不問国事对国家对自己都沒有什么区别呢？自己有个主张和沒有个主张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他們觉得积极来提出意見似乎也沒有什么必要，別人也不見得考虑，不贅一詞，国家的事还是办得很好呢？如果真是这样想法，是不是說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还没有很好發揮呢？那么怎样能把他們这方面的积极性發揮出来呢？——說到了这些問題，我想可能会超过我这篇杂文的范围。那是春暖花开时节的事了。

选自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摘录）

（1957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章伯鈞

“共产党的民主精神已經得到了极大的效果。”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說，今天他談个人的意見：第一点，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見，看来是很正常的。……比如近两周来提出的学校中的党委治校的問題，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就我接触到的朋友來說，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認為共产党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党是可以从政治上領導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听取教授和学生的意見。这証明，鳴，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現在應該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最近我参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談会，感到仍有人沒有把話說完。在一次高級技術人員座談会上，有人发言后問我到底怎样，下边可能顧慮更多。因此，今后應該彻底地广开言路。現在光是中上层人物的意見，固然能够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見，但是，还應該普及到下层才好。下层干部在几年来对国家貢獻很大，其功不小；但是犯了不少錯誤。因此希望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見。

“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其次，談几个問題：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政协會議以后，国家领导方面很重視各方面的意見，民主生活日漸丰富。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針性的重大問題，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見。如这次整风，結合检查改进工作，当然是好的。过去，作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国家带来了損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貫制、推广双輪双铧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国务院的部长們，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討論，或經過民主党派、高級知识分子、专家的討論，就会減少損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又如体制問題、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問題，去年只交地方党委書記和少数党外高級干部进行討論。主要是党内討論。應該利用政协、人大的各种委员会、民主党派去討論，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認識和經驗。再如文字改革，我認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階級斗争問題，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問題，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討論。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大有問題，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沒有意見，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党内外展开討論，應該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討論。

陈梦家在文汇报上的意見，我部分地同意。

“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现在工业方面有許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滿，应该展开广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所要作的大事の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对国家准备作的事情要有經常的討論。

近来，政协委员到下面視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还不能停留于視察工作，要进一步讓大家經常討論国家的重大問題。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會議可以少开。”

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說会多，这要看什么样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會，形式主义的會，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这样的形式主义的會，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够提出問題，拿出材料認真討論，有丰富的內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見解，这种會大家不会感到多的。关于体制問題，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討論，文字改革問題也可以由大家討論。

在政协、人大常委会里面，共产党中央要考虑放上一批能

干的共產黨員。共產黨的許多領導同志，有知識，有精力，可否在統一安排的原則下，分配一部分參加到上述機構里面，經常同各方面的人士交換意見，而不要象現在的一些共產黨的同志那樣，只是看看你們怎麼講，今後人大常委會、政協討論問題，各部應該有常務部長出席代表各部說明政策。這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議會政治。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於老年的知識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的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社會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一再討論，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

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在革命中發生了極大的作用。這方面的經驗還得總結一下。從馬克思、列寧那里找理論根據教育共產黨員，那固然必要；但是還不如從實際生活中，從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合作開始直到現在的統一戰綫工作，作一個總結，對黨員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門的總結的時候，也可以請有關的民主黨派參加，這也可以少發生一點主觀主義的毛病。

選自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

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摘录）

（1957年3月18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會議上的发言） 罗隆基

去年冬天我到四川去視察的时候，曾經接触到高級知识分子方面的問題，最近我負責主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員关于知识分子問題小组的座談会，又听到了許多有关知识分子問題的反映，現在我根据这些材料来談談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

一年来的成績和缺点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由于党和政府的努力，在貫徹对知识分子問題的政策上，在全国范围內有了很大的成績。知识分子的工資普遍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問題解决了。高級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如時間、助手、圖書資料、仪器設備等問題，到今天尽管不能处处尽滿人意，但在可能范围內，都得到了改善。高級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有了广泛的和适当的調整。最重要的一点是，一般高級知识分子都感觉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高級知识分子就增强了自己的信心，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般高級知识分子不再象一年前的消沉，現在兴奋起来了；不再象一年前的消极，現在积极起来了。今天旧的高級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們應該肯定，并且必須肯定。

另一方面，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旧問題是不断地在解决；新問題是不断地在产生。各位委員从

視察中和座談會中當然都知道，當前知識分子的問題仍然還是不少。在這裡，我認為有兩點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有人說：

“代表委員們年年視察，次次反映，反映儘管反映，問題還是問題”，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妥當的，是與事實不符合的。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常委會就印發了一些有關單位答复解決高級知識分子問題的材料，這就充分地證明上面這種悲觀論調是錯誤的。第二，國家正在一個發展很快的過渡時期中，對任何方面的問題，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是沒有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我們的責任只能是：幫助黨和政府，天天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並且解決問題。

當前，在知識分子方面，還存在些什麼問題呢？在安排和使用方面，還有某些需要進一步調整的情況。學哲學的人在圖書館編書目，學法律的人在機關里做會計，學染料化學的人在中學教語文，學機械工程的人在中學教歷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學政法、財經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學校掛名領薪，而沒有開課的人還是不少，甚至散居在社會上的高級知識分子中，還有英國留學生拉板車，美國留學生擺煙攤的情形。這當然只是個別地區和個別單位的事例。這次知識分子問題小組座談會建議黨和政府通令全國，普遍檢查貫徹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的情況，我個人是同意這種建議的。這種情況是應該加以糾正的。國家現有的高級知識分子都能各盡所長，各得其所，這是知識分子的利益，這也正是國家的利益。

……現在中、下層知識分子又起來呼喚了，認為高級知識分子得到了黨和政府的照顧，而對小知識分子，特別對小學教師的照顧不夠。其實舊年工資調整，對小學教師的工資提高了很多，他們普遍表示興奮。但是小學教師教書的工作量已經很重，而有些地區的幹部還要驅使他們充當雜役，替機關抄寫，

替書店推銷，替农村打井筑堤，替粮庫晒谷守仓。小学教师疲于奔命，不听命令，就要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我們听到这样的呼吁：“救救六千三百万小学儿童的老师吧”。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视和轻视小学教师，的确是一种偏差。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是应该加以纠正的。

领导干部要主动努力改进工作

今天的關鍵問題，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誠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力量，为祖国建設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员之間有隔膜，……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变化，經過肃反运动，高級知识分子的队伍更純洁了。各級党和政府努力貫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了高級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今天一般高級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們不只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领导。諸位委員，今天的問題是党员干部怎样来改进领导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彻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融洽合作的目的。

……在党员干部的“主动努力”方面，我愿意提供几点参考意見。举些反映中的具体的事例來說，改善高級知识分子的待遇，采用評級制，少数教授埋怨評級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級高，党外人等級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机会少。这种反映当然是少数的，并且是片面的。尽管如此，这就值得领导干部主动努力，进行检查，看行政工作上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够的缺点，看是否是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事实果真不是如此，事实就会給埋

怨者以具体有效的說服教育。……当时我以为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我們的思想意识，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先求团結，其“存异”的方面，可以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各就所見，暢所欲言，这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非愈辯愈明，真理愈爭愈显，百川异流，将来总是同归于海。然而事实怎样？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爭鳴”，鳴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時間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据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級知识分子顧慮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鳴。这种現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黨員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認識和体会。他們認為两个号召提出以后，今天社会已經是淫辞放恣，异端猖獗，他們就热心于尊統卫道的工作，以今之韓愈自任，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議論，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鳴”者，不惜口誅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說，传道統。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更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更加退縮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顧后，栗栗危惧，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这种現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現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認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糾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加深了解，消除彼此間的隔膜

隔膜是从双方面来的，消除隔膜必須双方面共同努力，倘此方認彼方为思想落后，而彼方認此方为学术外行，只看見了自己的长处，却忽視了对方的长处；只看見了对方的短处，却忽視了自己的短处。不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那

末“落后”与“外行”之間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

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彻底認識和了解的問題。在我个人看来，我們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馬列主义理論外，还要好好地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們才能明白革命老干部經過了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鍛炼。革命老干部語言比較坦率，行为比較憨直，批判比較严厉，斗争比較猛烈。这是长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识分子必須了解認識的。领导干部从軍事革命工作轉到文教领导工作的崗位上来，固然应该研究新的业务，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讀讀“資治通鑑”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名利观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谓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这一大套构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识分子不幸而有的弱点。它們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們变本加厉了。彻底扫除这类思想上唯心主义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的同情帮助和耐心教育。

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政治亦有他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們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則“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則

“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隴中待訪的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我不是說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对不是的。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怎样来统一这个矛盾，怎样把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鼓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消除彼此间的隔膜，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在目前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同旧知识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是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我们今后必须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切指示来处理问题。这样，党与非党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趋于融洽了。

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我愿就个人的见解谈一点我们民主党派今后的任务。就拿我们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几年来我们民盟全体盟员在自我教育和改造以及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方面。是做了些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也有缺点。自从领导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后，我们各

民主黨派的責任加重了。怎樣進一步來做好我們的工作，完成我們的使命，這是我們當前一個嚴重的課題。在這次視察中，我們聽到這樣的反映：民主黨派中有些人的工作是“錦上添花，火上加油”，只是觀風色，看氣候，扣帽子，打冷拳。這些反映是值得我們深切反省的。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下，我們今後應真正成為領導黨的助手，我們應該真誠地接受黨的領導，坦率地對黨提出批評。我們要認真地貫徹“互相監督”，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今天一般舊的高級知識分子，思想上都有了進步和提高。極大部分的老年高級知識分子是業有專精，學有專長的，我們應當殷勤地接近他們，了解他們，虛心向他們學習，並且竭誠幫助他們。我們要代表他們的利益，反映他們的問題。協助他們克服困難，鼓勵他們貢獻意見，團結他們互相學習，共同改造。這是我們民主黨派每個成員的任務，我願同我們各民主黨派的同志們共同勉勵！

選自1957年3月23日《人民日報》

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摘录）

（1957年5月14日）

章乃器

一、“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已經有不少人說过，党与非党之間有“一道墙”、“一条沟”。我現在想来談一談“墙”和“沟”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我想，首先，这个思想基础，如同党的文件和其他各位所說的，当然是党领导革命和建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但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受到了全世界公正人士的贊揚。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发生了副作用：不少非党人士对党員有自卑感；某些党員則有驕傲自滿情緒。其次，我又要說到教条主义了。“联共党史”記載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詞，一开头就說：“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話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員，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員，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話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我还没有找寻出来斯大林当时說这句话有什么客观的需要；单从文字看来，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說法馬上就会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我也听到过另一种解释：“特殊材料制成”指的是革命理論的教育和组织的鍛炼。但是有人不同意，認為这些都只是对材料的加工而不是材料的本身。我想，尽管說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作为一种带政治口号性質的句子，也是不应该有可此可彼的两种解释的；它是必

須明确到足以使羣众单凭直觉就可以正确理解的。

必須說明，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同上述的句子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所看到的党员，絕大多数是朴素的、謙虛的。尽管进行整风运动以来已經揭发了許許多多的党员和党组织所犯的錯誤和缺点，而且今后还会揭发更多的錯誤和缺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了每个人都难免有錯誤和缺点，以至领导和羣众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一些理由以外，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一千二百多万党员。只要有1%的党员犯严重的錯誤，絕對数字就是十二万多人。这么多人在领导地位上犯錯誤，对国家和人民就会造成巨大的損害；而这許多事实的揭发，当然可以在全国报纸上熱鬧得很长一个时期。

但是，尽管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也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种說法就不在我国起作用。因为，“联共党史”曾經在全国展开学习，而教条主义是在党内党外都很流行的。說这种說法不会起到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的作用，是难以設想的。

事实也已經很明白。例如，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針、政策，不但不是秘密，而且應該是大肆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的。象我們这些高級干部，八年来参加了无数次的重要會議，参加了方針、政策的制定；党所期望于我們的，正是掌握方針、政策，帮助党和政府向广大人民羣众展开宣传。但是，竟还有些非党同志，認為自己不可能掌握方針、政策，只有党员领导同志才能掌握方針、政策。八年了，仍然是这一套，这不能不說是自卑感的明証吧？同时，也有不少党员领导同志，以为只有党员才能掌握方針、政策，非党人士是不行的。这是不是驕傲自滿，以特殊自居呢？这是不是宗派主义的一种形式呢？当然，体会

方針、政策不够，掌握不准，是完全可能的。但，只要非党人士不自卑，党员不以特殊自居，通过同志式的帮助，不够、不准的缺点是完全可以弥补的。

其次，关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毫无疑义，党的革命理論的权威，这是沒有人能够否認的。但这絕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論的“垄断”；絕不是如某些人士所想的那样，只有党员可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論学习中取得成績。在这种錯誤思想的支配之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論学习在許多場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非党人士带着自卑感学习革命理論，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創造性；不是創造性地学习理論，当然，就只能是教条主义地学习了。某些党员以“理論大师”的地位出場，旁若无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因此，我觉得，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許許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检查自己的不接受领导的資产階級政党思想。

二、党组织与行政系統之間

“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較少，愈到下层愈多。我有这样的想法：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認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設社会主义的武器。因此，不但国家行政机构沒有被足够地运用，国家权力机构也沒有被足够地重視——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不正常和不充实的情况是严重存在着的。

.....

我还有另一种比喻：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了。

比喻总不可能完全确切的。但，无论如何，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导，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积极性，显然是有利于把国家工作做得更好的。

三、对统战部的批评

统战部工作当然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严重的缺点。缺点的形成，是同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之间，是非本来是很多的，宗派本来也是存在的。这一点，统战部应该是知道的。统战部处理的方法，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更由于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某些非党人士以“上司”对待党员，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可能的。

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没有深刻认识到非党人士性格的十分复杂，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旧社会遗留的

虛偽作風和名位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物中嚴重地存在着。加上划圈子而圈子不大，多少不免偏聽偏信；奔走殷勤的便算是靠攏黨，否則即使忠心耿耿，埋頭苦干，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而努力，也難免被置於異己分子之列。有人說，民主黨派存在着政治工作也適用“按勞取酬”的庸俗作風和“論親行賞”的宗派主義。這種批評即使不完全符合實際，也值得統戰部的檢查。大概，統戰部的工作太忙了，太忙也會發生官僚主義。唯唯諾諾，隨聲附和，容易對待的，以至善於幫同壓服不同意見的，便算積極，便算忠實；喜歡提意見，而又堅持自己的主張的，總不免感到麻煩，便作為“鬧獨立性”。這就是為什麼黨一再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提出不要有無原則的捧場，而個人崇拜和無原則的捧場仍然存在；黨再三要求聽到不同的意見，而不同的意見總難充分發揮。我們經常看到的是一團和氣，但一旦爆發起來也往往變成舌劍唇槍，難以收拾。統戰部今後如能放大圈子，深入民主黨派的機關和下層，（那裏面有不少陰暗的角落）對分清真假、明辨是非上多多注意，我想對於改進民主黨派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幫助的。由過去直接管得太多而改變為少管一些、多查一些，這是好的；少管而又不查，那就不大恰當了。

非黨人士批評黨的工作，總難免是片面的、表面的，只供參考。

選自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報》

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摘录）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儲安平

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見”为題的发言中說：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羣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个問題。这个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据我看来，關鍵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問題上。我認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証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論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細，都要看党员的顏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見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責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羣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現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般宗派主义現象的最終根

源，是党和非党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羣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說，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是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羣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决解。

选自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第五分册

整风运动和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校内用书 请勿外传 定期收回

一九七六年三月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
六〇——四六一页。

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

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一〇页。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一一页。

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

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轉选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六年第二十期第二頁。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三二頁。

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仔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

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
〇九——五一〇页。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八四页。

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

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需解决的各项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长，错误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结迅速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我们正在六亿人口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这个人民自我教育运动，大概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今后，我们准备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运动时间可以大为缩短，作为解决我国整个过渡时期各项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必须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我们方面的，是讲道理的。这一点已为运动的全部经验所证明。

我们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整风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说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转选自《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二十三期第二十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

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
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八二页。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
一八页。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

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
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八五—
四八六页。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

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一九页。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八七页。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少数。这种

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五
〇二页。